



19世纪里昂城市改造过程中,由于街道的宽度与布局以及建筑外立面的变化,导致了城市声音景观在一个世纪内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上接12版)

有的地方意象。尽管可感知的方式很多,但事实上,以往在做文化地理研究时,我们更愿意直接或间接采用视觉的方式去获取地方性知识,形成地方意象。这一倾向当然与我们过去一直试图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认识地方、解释地方的理念有关。文化地理学者为此还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方式来理解和阐释丰富多样的地方,力图以上帝的视角来考察文化现象的地域特征,分析其地域差异的空间特点(王恩涌等编著《文化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早期对文化地理研究居功至伟,可以让我们较为容易地把握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无法用文本表达,甚至仅仅是难以用明确的语言表达的鲜活的内容,比如气味、声音等在这样的研究范式下被遮蔽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也同样,主要以那些保留在历史文献中的以视觉方式采集到的资料对历史时期文化现象与区域差异进行大尺度的、静态的复原(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事实上,这一研究路径在早期文化地理研究中影响非常之深刻,即使是以声音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音乐地理学,这样的取向也十分突出。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受历史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启发,中国音乐学界已开始关注起音乐、或者说是民族音乐的地域差异(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

色彩区的划分》,1987),这些研究带有鲜明的地理学倾向。果然他们很快在1990年代初祭出了音乐地理学的大旗(乔建中《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载刘靖之编《民族音乐》第三辑,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第20-29页)。然而,早期的音乐地理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同一时期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模式,即主要是大空间尺度的、断面式的静态研究。这样的研究虽然不乏科学、严谨,但剥离了供其养分并与之水乳交融的地域文化,声音尽管纯粹,但它对透过文化现象感知地方来讲,却缺乏一种活泼泼的灵动。

随着上世纪后现代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的冲击,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开始发生转变。其中之一,就是调整了现代性中过于关注时间的倾向,从此空间开始受到重视,被认为是在社会关系的生产中居于与时间同等重要地位的元素。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就明确指出,空间是由社会构建的产物,而社会构建物本身又是按空间组合的,因此空间是相互系列动态的过程——权力和象征——加以构建的话语领域(福柯、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1-1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显然,空间从此不再是地理学的专属名词。

由于空间不再是地理学的专属名词,其他学科的介入与研究,反过来迫使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重新审视自以为熟知的空间。这时候空间不仅仅是那个有着明确物理属性的实体,而是内涵着各种力量交织的社会关系。同时,在社会关系的建构中,空间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容器,而是在其中能动地重构地方、再造区域。地方和区域也顺

理成章地不再是纯粹的物理实体,而是带有文化属性的空间。透过身份认同或情感印记,地方在空间生产中获取了意义,空间在地方建构上得到了升华。在这一交互过程中,地方和空间都被重新阐释:从文化地理来看,地方是聚集了人们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多种情感的场所;而空间更多带有抽象的表征意义,具有隐喻性(周尚意等《景观表征权力与地方文化演替的关系——以北京前门—大柵栏商业区景观改造为例》,载《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第1-5页)。

重新阐释后的地方与空间被赋予更深的含义,而附着在其中的景观也同样被再诠释,它现在主要是指研究一个地方/空间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社会意义的,既有现实的也有表征的。既然地方的意义是透过表征呈现的,通过人们感官可获取的信息在认知地方过程中都应该具有同等价值,那么,我们就需要反躬自问:除了习以为常的景观(landscape)外,我们在过往的研究中是不是还忽略了什么?

由此不难理解,soundscape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这些常年浸淫在可视文化中的文化地理学者具有怎样的振聋发聩的功效!它使我们猛省:声音本来一直是人们认知世界、理解地方的通道之一。特别是soundscape,或者说声音景观,强调的是主观的聆听(hear)[Rhianon Graybill,“‘Hear and Give Ear!’:The soundscape of Jeremiah”,*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2016,Vol.40(4):pp467-490],相对于比较客观的观看或凝视(gaze)更能激发人们对地方的强烈情感,“声音不是简单地生动服务,相反的,它还消弭了自身以及言说者和空间的界线”(上引文,pp484)。因此在地方感建构

中的意义更为深远,对于文化地理学者最关心的地方以及地方性的阐发无疑有着更为突出的价值。

Soundscape 与新文化地理学

Schafer 最初提出 soundscape 时,旨在将音乐与各种声音还原到它产生的地域中,而不是将它们抽离出来作样本式的实验室观察。因此,他强调在考察 soundscape 时,需要区分一般的声音(keynote sounds)、标志性声音(soundmark)和符号性声音(signals)。这也成为早期 soundscape 研究的主要范式[K. Kato,“Soundscap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connectivity”,*Sites:A Journal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Studies*,2009,Vol.6(2):pp80-91]。然而,随着人们对 soundscape 研究兴趣的逐渐增强,不同学科都跃跃欲试,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对这一专题进行研究,使得目前的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由于 soundscape 与地理学之间的天然联系,地理学者成为研究 soundscape 的当然主力。如法国学者 Olivier Balay 对19世纪里昂城市改造过程中 soundscape 的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19世纪里昂城市改造过程中,由于街道的宽度与布局以及建筑外立面的变化导致了城市声音景观在一个世纪内发生了重大变化(“The 19th 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urban soundscape”,*Intra-noise*,2007,Istanbul)。

不过,目前从地理学角度对 soundscape 进行研究的似可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采用地理学独特的空间分析方法,从技术的角度入手分析 soundscape 的特点,目前是为城市规划提供借鉴。如韩国学者 Joo Young Hong 和 Jin Yong Jeon 用空间统计建模的方式分析了首尔城市区域声音景观变量之间的空间关系。其中,声音景观地图的绘制需要收集大量的城市交通噪音、人声、水声和鸟鸣等声音数据,再参考心理学参数进行空间分析(“Exploring spatial relationships among soundscape variables in urban areas:A spatial statistical modelling approach”,*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Vol.157,pp352-364)。这样的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目的,都具有经典地理学的意味;另一类是借用结构主义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透过分析音乐在公共领

域中政治抗议活动的作用,讨论 soundscape 与身份建构、社区区隔和极化以及权力斗争之间的相互关系 [Konca Saher, Murat Cetin, “Music and performance as sonic acts of political struggle; counter-political soundscapes in urban realm”,*Sociology Study*,2016,Vol.6(6),pp378-391]。将声音景观与政治权力斗争结合在一起,这是典型的新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

在新近的声音景观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那些带有明显后现代意味的名词:身份认同、地方记忆、权力关系等等(汤亚汀《后现代语境与中国声音景观断想——兼及“新格罗夫”条目“音乐人类学:当代问题”》,载《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如 Pinar Yelmi 在对伊斯坦布尔的声音景观文化进行研究后,指出声音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构成,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强化了人们的地域和文化身份意识 [Pinar Yelmi, “Protecting contemporary cultural soundscapes 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ounds of Istanbu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2016,Vol.22(4):pp302-311]。从日常生活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研究 soundscape,虽然是文化地理研究的特色,但显然更接近 Schafer 最初提出 soundscape 的本义。

对 soundscape 的青睐,不仅仅局限在文化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也对这一令人兴奋的主题抱有热情。澳大利亚学者 David Garrioch 详细研究了17世纪以来社会与政治结构变化下欧洲城市 soundscape 的演变历程。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是其中的关键词 [“Sounds of the city:the soundscape of early modern European towns”,*Urban History*,2003,Vol.3(1):pp5-25]。这一研究如果非要贴一个标签,大致可归为新文化史学。

由 soundscape 概念的产生、发展以及研究现状可知,soundscape 的要义在于强调声音与环境的关系,这正与文化地理学所关注的文化生态一拍即合。尤其是透过声音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声音在感知地方方面的意义被不断阐发,声音成为与地物同等重要的景观要素。揭示声音在表征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与意义,应该是 soundscape 成为文化地理学研究主题的重要动力。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批准号:41171120)阶段性成果] ■